

新冠疫情引发的香港经济滞后效应正在逐渐浮现，近期已有研究报告显示香港将陷入“催化性衰退”。还有人担心，香港会在国家发展中被边缘化。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以及邻近地区的快速发展，香港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对中央“送大礼”有依赖心理，而要扮演更加开放的窗口角色，尤其是做好面向内地的开放。

过去一段时间，香港遭遇了双重打击，一方面是社会风波的冲击，另一方面是疫情来袭。香港目前的失业率已达到6.4%，这是16年来最高的。今年香港GDP预计会出现较大的负增长，目前除了金融业，其他行业尤其航空业可以用惨淡来形容。

香港想脱困，要改革，更要开放。香港过去的开放，更多是面向西方国家的开放，香港过去的国际化，更多表现为“西方化”。但世界仍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香港未来要更加开放，真正实现“国际化”，就要对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放，同时也要对包括珠三角地区在内的更多祖国城市开放。

对香港而言，开放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时任港督麦理浩就已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他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开放金融业，包括先后撤销

外汇管制、黄金交易管制，取消自1965年以来停止向外资银行发放牌照的规定，以及取消外币存款利息预扣税等放宽外资银行赴港开业措施，以此吸引美资、英资金融机构前往香港投资。麦理浩还设立工业投资促进委员会，以此吸引外资前来香港投资工业。

较少为人提及的是，麦理浩也重视向内地开放。他在1979年应邀访问北京等地，成为二战后首位官方访问内地的港督，改善了内地和香港的关系，并促进了两地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

然而，如今香港的不少行业对内地的抗拒、封闭心态颇为强势，在一些方面甚至已累及自身。以医疗行业为例，新冠疫情暴发期间，内地医护原本可更大力援助香港，却被本地医疗界视为洪水猛兽；内地廉价的检测资源和试剂，也一度被不同利益集团抗拒，甚至横加诋毁。

其实，香港应向内地开放医疗、教育等更多行业。如果能够引进一定数量的具有国际水平、经费丰富、通晓英语

和粤语的内地医护人员，不但有助于香港对抗疫情，也有助于香港市民接受更好、更全、更多选择的医疗服务。

开放教育行业的意义则更为深远。中小學生都是未成年人，容易受学校老师的影响，在部分老师的刻意引导下，他们容易被灌输反政府的政治理念。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应考虑进一步开放教育，引入多元办学团体，尤其是鼓励爱国爱港以及内地背景的办学团体在港办学。

香港面向内地的开放可从与深圳的深度互补入手。过去40年，深圳和香港是相互成就的。尤其前30年，深圳受益于香港人才、资金和技术以及产业转移，得以快速崛起；香港又因为制造业转移，让其腾出更多空间和资源大力发展金融业，成就了香港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深圳和香港以前是“青梅竹马”，现在可以“开花结果”了。未来深圳和香港可以运用各自的优势实现深度互补，一方面，香港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深

圳拥有良好的创业环境，香港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可以到深圳创业，这是一层互补；另一方面，香港拥有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在深圳发展壮大起来的企业也可以选择到香港上市融资，这是另一层互补。通过一去一来形成良性循环，深港可共同打造“离岸科技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香港向内地开放可以依托的平台。从数据上看，粤港澳大湾区拥有7000多万人口，而香港本土只有700万人口，当香港产品拿到大湾区售卖，营业额将有呈10倍增长的机会，广阔的市场是最直观的机遇。此外，生活在大湾区的居民收入普遍较高，他们有着广大投资债券市场、购买保险等需求，这都可以给香港金融业带来巨大支持，巩固和推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相信在国际金融中心和中国离岸科技中心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下，香港将进一步提升竞争优势，打造出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将不仅可以确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龙头城市地位不褪色，也能进一步推动香港未来的社会、科技和经济发展。▲（作者分别是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



阿拉伯之春十年后看中东困局

刘中民

“阿拉伯之春”已经整整延宕十年，因此有人称其为长周期的“阿拉伯之春”。十年来，中东地区在国家转型方面，迄今没有成功转型的范例，更谈不上有借鉴意义的发展模式；在地区和平方面，原有和新生的热点问题无一得到彻底解决。

这十年，中东乱象不断。首先，外部大国的主导能力在下降，但同时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上升，带来的破坏性更强。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极端做法；又比如美俄、俄土等在许多问题上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都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

其次，地区国家分化组合的复杂性增加。在沙特与伊朗持续对抗的同时，土耳其与沙特矛盾的激化，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媾和，围绕地区热点问题的各种阵营组合令人眼花缭乱，地区格局的冷战化、代理人化、宗派化特征日益突出。

再次，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在大中东地区，原有的内战或准内战（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伊拉克）、国际冲突等传统安全危机持续恶化，且新的风险源不断增加（如近期阿富汗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以及土耳其、以色列等中东国家的强势介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核扩散、难民、海洋权益争端（尤其是东地中海）、水资源争夺等危机持续加重。

最后，中东的国家转型和国家建设异常困难。当前许多中东国家都面临国家转型和国家建设的压力，国家转型之困在于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国家建设之难

在于其政治经济发展难以摆脱外部控制和内部身份政治（教派、族群等）困扰。

这样的中东乱局有其系统性根源。第一，中东地区体系存在强外部输入性和外部干预性。中东地区体系形成于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之上。中东地区事务、热点问题和国内问题，均无法由地区国家合作或国家内部自主性解决。中东地区事务主导权主要掌握在美国、俄罗斯、欧洲大国等的手里，中东的地区主义十分孱弱。地区国家之间尤其是地区大国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构成第二层次的外部干预，并在许多热点问题上形成双层或复合代理人博弈，当前的中东热点问题均陷入双层或复合代理人博弈，这是中东热点问题久拖不决、难以政治解决的主要根源所在。

还有，无论是殖民时期的殖民统治和委任统治，还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中东国家的深刻影响，以及冷战后西方的“民主改造”和新自由主义对中东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强势干预，都使得中东国家的发展路径具有严重的外部依赖性。与此同时，本土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运动受挫及其与外来思想和制度的冲突，进一步强化了中东国家的发展之困，导致治理赤字和发展赤字日趋深重。

第二，中东地区体系存在强对抗性和竞争性。地区国家间缺乏安全互信，传统零和博弈的安全困境观念仍是地区国家安全观念的共识。如沙特与伊朗的对抗、沙特与土耳其的竞争构成当前地区国际关系的两条主线，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媾和则是极具消极性的

合作，其重要原因在于对抗伊朗和美国的操控；国内层面，政府与反对派的关系、教派关系、族群关系、部落关系、宗教与世俗关系，同样围绕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形成对抗性和竞争性关系，甚至走向内部冲突，并为代理人战争创造条件。如“阿拉伯之春”以来埃及等国家的教俗对抗等困境，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利比亚的教派、族群和宗派冲突都是其具体表现。

第三，中东地区体系面临强身份政治的困境。一方面，中东民族国家的构建深受超国家和次国家认同的困扰，这两类身份政治撕扯下的中东民族国家建设屡遭挫折。另一方面，作为民族国家构建基础的世俗民族主义又受到泛伊斯兰主义等伊斯兰思潮的冲击，甚至发生矛盾冲突。

因此，基于身份政治的困境既影响民族国家构建，同时由于民族、宗教、教派的身份认同具有跨国性，又使其不断外溢以致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甚至酿成国际冲突。“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与伊朗的民族和教派对抗，土耳其内政外交中“双泛”复苏，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的教派冲突等，均是中东强身份政治带来困境的表现。

由此可见，外部干预、安全困境和信任缺失、身份政治，构成了中东乱局的地区体系根源，十年来的“阿拉伯之春”不仅未能解决、甚至进一步加剧和激活了上述困境。实现独立自主、建立安全互信、摆脱身份政治的羁绊，进而完成国家建设和地区秩序的构造，是中东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出路所在，但这一切对目前的中东来说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巴黎“斩首”惨案之后，法国面临一轮如何对待言论自由和尊重宗教的激烈争论。孰是孰非，各执立场。但也有人认为，当下的法国应该将抗疫与民生置于更重要的位置。

法国现在是欧洲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四五万，如果折合成中国的人口基数则是单日新增约80万到100万。严重程度可想而知。在如此严重的疫情之下，此次马克龙总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强硬，一来或是为了转移公众对政府抗疫不力的追究，二来2022年总统大选的筹备工作已经陆续展开，马克龙想要确保连任，能够打的牌并不多，不能排除他有将法国现有的国内疫情危机转化为针对某个特定族群矛盾的考虑。

法国社会聚焦的侧重点偏了吗

赵永升

那么，这种外化国内矛盾之策是否有效？法国之前的反恐效果是明摆着的。2015年可谓是法国的“恐袭年”，其中有众所周知的《查理周刊》恐袭案。但当时的奥朗德总统没有顺势采取强硬的反恐措施，整体反恐力度较小。

而此次马克龙的高调以及主动发起攻势，为其大规模关闭特定宗教场所以及特定族群学校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基础。法国将陆续关闭数千家特定宗教场所和特定族群学校，同时将有数以千计被列入危险分子名单的人遭到驱逐。最重要的是，马克龙将会利用此次机会推动在立法上作出大的修改，立法的范围也将大大超出简单的常规“反恐”范畴。正如马克龙在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他认为法国决不允许任何族群存有对女性的歧视，也不允许特定族群将女孩子视为远不如男孩子的做法，等等。

只是，不管是宗教问题还是族群问题，目前并不是法国的主

要矛盾。新冠疫情和法国的经济形势，才是如今法国急需解决的两大难题。高达9.7%的失业率，如果分摊到年轻人这个群体里的话，大约每四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失业。尽管欧元区第三季度经济超预期反弹，但由于第二波疫情来势凶猛，欧洲经济前景已经显著恶化，欧元区第四季度经济恐将再次陷入负增长。低迷的经济局势无疑也是马克龙总统的一个心头痛。

当然，无论是旨在摆脱法国国内严重疫情和低迷经济的双重困境，还是旨在在大选连任成功，马克龙如今的应急之举都在情理之中。但也要清楚看到，这些举措仅为缓兵之策。相比之下，民生更为关键。

如果对恐袭的成因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涉案者大多是法国本土恐怖分子，他们在法国社会的底层、几乎被边缘化的生存境地，可以说是导致这些年轻人被极端思想诱导并走上恐怖邪路的重要原因。因而，无论法国政府的反恐政策多有力，恐怖主义的根子和土壤并没有得到消除。从其他国家的反恐经验来看，提高特定族群的文化水平和培养其从业技能，最终使其脱离贫困并走上富裕之路，才是从根上消除恐怖主义的可取之策。

至于法国的整体经济，法国当下的疫情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二次封国”能否切实落实到位是关键。但基于拉丁文化的自由散漫和不守纪律，“二次封国”的落实效果很可能会大打折扣。由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欧盟其他成员国的疫情也愈加严重，它们已是自顾不暇，要想走出经济低迷，法国还得从基本的改善民生做起。▲（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